

民

国

从书
政生

李学通 著



人

物

翁文灏

兰州大学出版社

系

大

书生从政——

翁文灏

李学通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Et24/06

书生从政
——翁文灏

李学通 著

于泽俊 策划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216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7 千字 印数:1—8 000 册

ISBN7-311-00961-8/K·112 定价:15.50 元

序 言

翁文灏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然而他确实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且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记的人。翁文灏先生是一个科学事业的组织者，一个历史动荡时代的忠实建设者。虽然他一生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1951年即率先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算是终得“正果”。

翁文灏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是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怀抱科学救国之志，与章鸿钊、丁文江两位先生共同培养出我国第一代地质学人才，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石。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兼任教职，中国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均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地质调查所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国早期科学事业中成就最突出的机构之一。翁先生也以其卓越的科学贡献，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中央研究院的创始者或重要主持人，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略日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翁文灏先生为救国家，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

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在他竭尽全力的推动督率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翁先生本欲辞官，一心致力于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点和坚强的毅力，1948年他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长，成为蒋介石“戡乱”反共的工具，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犯之一。虽然此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形势下的权宜安排，并非出自翁先生主动，但其错误的言行，我们今天亦无需为贤者讳。

可喜的是，翁先生歧途知返，觉悟较早，1949年又积极为实现国内和平努力奔走。和谈破裂后他拒绝去台，赴欧暂避，并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的1951年初，回绝台湾、美国的邀请，毅然回归祖国大陆，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回国后，翁先生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悉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我于1927年在黑龙江穆稜煤矿与翁先生相识，并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对我的一生曾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经办陕北油矿、整理河南焦作中福煤矿，还是抗战时期主持四川煤矿、创办玉门油矿，都是在翁文灏先生极力推荐、全力支持和领导下，我才做出了一些成绩。回顾翁文灏先生的一生，我认为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追思纪念：

一、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翁文灏先生在少年读书之时，有感于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立志救国，记得他的诗中有“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句子。留学回国后，他拒绝高薪聘请，投身到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事业之中，筚路蓝缕，在极其艰难中开创了我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翁先生

“为国家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方弃学从政，欲图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以增强抵抗日寇侵略的力量。他的次子翁心翰也在他的鼓励下参加空军，投身御寇，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摒弃美国许多团体、公司的邀请，决然归国，义无反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直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翻译介绍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著作，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欢欣鼓舞。

二、崇尚科学、服从真理、顺应时代的人生态度。翁文灏先生原是清末秀才。科举废除以后，他顺应时代潮流，转投新式学堂，学习近代科学，并留学西欧，成为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地质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中，他一贯秉承科学的精神，既不迷信权威的既定之说，也从不妄自尊大，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崇尚科学，服从真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故而他能够正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并取得全国政权的现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就回归了祖国。

三、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翁文灏先生多年主持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事业，官至行政院长，是当时“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堕落的官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蒋介石极力拉其入阁，为自己装点门面。当时主管和经营国有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能够做到廉洁自律，不能不说是翁先生表率起了很大的作用。

翁文灏先生一生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学通同志经数年努力写出的这本传记，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填补了一项空白。要全面总结翁先生一生各方面的成就、贡献及经验教训，20余万字的传记尚显不足，但其开创性的努力值得称道和庆贺。愿我们学习翁先生

的爱国精神、科学态度和廉洁奉公的作风,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
以告慰逝者的英灵。

孙越崎

1995年9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从秀才到博士	(1)
一. 石塘翁氏	(1)
二. 少年秀才	(7)
三. “寒旦三文”	(8)
四. 官费留学	(10)
五. 鲁汶博士	(12)
第二章 为中国地质学奠基	(18)
一. “愿为地学启朝曦”	(18)
先驱者的足迹	(18)
地质研究所	(22)
“最有功之教员”	(26)
留学生考试	(28)
二. 地质调查所	(29)
五项原则	(29)
筚路蓝缕启山林	(31)
中国地质图的绘制	(38)
中国矿产的调查	(40)
三. 中国地质学会	(41)
第三章 学说与学术	(47)
一. 矿产区域论	(48)
二. 甘肃地震考	(55)

陇东大地震	(55)
震区分布研究	(60)
中国第一个地震台	(61)
三. 开辟国际交往	(66)
四. 燕山运动学说	(72)
五. 周口店猿人	(76)
“龙骨”的秘密	(77)
新生代研究室	(79)
六. 中国地理科学创始者	(84)
清初测绘地图考	(84)
申报馆地图	(87)
组建中国地理学会	(89)
第四章 从书斋到政坛	(94)
一. 代理清华校长	(94)
校长风波	(94)
创办地理系	(95)
代理校务	(96)
二. 参加《独立评论》	(99)
“八九个朋友”	(99)
《我的意见不过如此》	(101)
三. 试探从政	(106)
牯岭讲学	(106)
国防设计委员会	(109)
武康遇险	(117)
四. 中福整理专员	(122)
五. 行政院秘书长	(131)
初掌机要	(132)
平息学潮	(137)
丁文江之死	(139)

西安事变	(142)
第五章 总馆后方经济	(148)
一. 欧洲之行	(148)
观礼英王加冕	(148)
接洽中德合作	(151)
参观苏联建设	(154)
二. 厂矿内迁	(156)
从上海出发	(156)
武汉的规划和顿挫	(159)
从武汉到西南	(164)
三. 建设后方	(168)
“当代第一人才”	(168)
国营工矿的发展	(171)
四. 农本局事件与权力之争	(184)
五. 开发玉门	(190)
六. 失子之痛	(198)
七. 战时生产局	(203)
八. 维持中基会	(207)
第六章 滑落深渊	(215)
一. 战后接收	(215)
二. 建设思想	(220)
三. 创办石油公司	(232)
垄断石油生产	(233)
胎死腹中的上海炼油厂	(239)
成立油轮公司	(241)
四. 出任行政院长	(243)
勉为其难	(243)
王云五方案	(249)
莫干山定议	(254)

“八一九命令”	(257)
四十天的“成功”	(262)
蒋经国“打虎”	(265)
失败与辞职	(268)
五.企望和平	(271)
名列战犯	(271)
溪口之行	(273)
总统府秘书长	(275)
第七章 回到人民中间	(280)
一.回家的路	(280)
滞留香港	(280)
避居巴黎	(283)
二.从反省中求出路	(286)
三.在历史中找规律	(290)
四.选举权波折	(298)
五.政协委员	(303)
六.最后岁月	(308)
七.魂息万安	(315)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书目	(320)
后记	(328)

第一章 从秀才到博士

一、石塘翁氏

公元 1889 年 7 月 26 日，即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石塘镇一个亦农亦商的士绅家族。

鄞县位于浙江东部，介于慈溪、镇海、定海、奉化、余姚之间，其地形东西宽南北狭，左右崇山环抱，蜿蜒磅礴，绵亘不绝；地势西部稍高，中部平坦，鄞江贯穿其间。这里江河密布，气候温和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稻田弥望，是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鄞县也是个很古老悠久的历史，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夏有董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邑为鄞。”春秋之时，这里为越国属地，《国语·越语》中有“勾践之地，东至于鄞”的记载。秦始皇时正式于会稽郡下设鄞县（今奉化）。唐武德年间置鄞州，设置于鄞江、余姚江、奉化江汇合之处名三江口的地方，“大历年移鄞治于此，至五代始，州县合治，而鄞亦改鄞”。^①鄞县原属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鄞县为其附郭县，即鄞县县衙与宁波府衙同在一城，一直相沿至清。宁波简称甬，故鄞江又名甬江。此处三江交汇，东临大海，港阔水深，海上又有舟山群岛以为屏障，是理想的天然良港，唐宋以来便为历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军港和造船业中心。城西南有四明山，古名句余山，西连余姚，南接天台，周围达 800 里，有 280 峰，中顶 5 峰，状

如莲花，上有方石，四周如窗，故称四明。城内有天童寺，规模浩大，为江南罕见，号称“天下禅宗五山第二”，为佛教禅宗胜地。有天封塔，始建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年间，高18丈，明7层，暗7层，传说地下尚有4层。城东南约15公里处有湖，名东钱，湖面广大，白波浩淼，山明水秀，风景如绘。明代著名学者范钦有诗曰：“澄波四望空，画舸泝冷风。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菰蒲临水映，洞壑与天通。即拟寻真去，桃源杳无穷。”^②

宁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宁波人自古具有强烈的进取冒险精神，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又造就他们游食四方的经商习惯。明清之际，宁波商人即已相当活跃，被称为“宁波帮”。1842年，宁波成为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悠久的商业传统，使宁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市场上的进口洋货生意，数十年间几乎为宁波人独占。

宁波城往西不远便是翁文灏的家乡石塘镇。翁家是个传统的绅商家族，相传其远祖在宋代时曾任明州观察，《宋史》有传。另有一种传说，其先祖元末之时从军，随军由福建迁此，后弃军从农，留居此处，繁衍生息。除此之外，翁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渊源，也没有传播久远的家传族谱。一直到了近代，翁家经营商业的特长才逐渐显露，也因而富裕发达起来。

翁文灏的高祖父翁开明（乾隆五十一年至咸丰三年，公元1786—1853年）凭藉一生的勤俭和精明，为子孙们留下了裕丰造酒坊（设在家乡）和裕大酱园、酒米铺（设在上海）等颇为可观的家业。到了翁文灏的曾祖父翁景和时，翁家的商业经营达到最高峰。

翁景和（道光三年至光绪三年，公元1823—1877年）字世昌，学名作霖，号梅臣，是翁开明的独子。他尤善经商，不但继承了家业，并且不断使之“发扬光大”，相继在上海开设长丰绸庄和大丰洋布店——经营进口洋布生意；在杭州开设打锡箔厂；在瞿州设上和南货店；在天津设乌木作坊；在宁波设宝大北船号、宝凤银楼；在本

乡有养鱼塘、农场、果园及祖传的裕丰造酒坊，集资达 200 余万。其中，大丰洋布店曾在上海近代洋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丰洋布店算得上是上海滩的老字号。1840 年前上海洋布进口尚少，1842 年开埠以后，洋货大批涌入，其中一种重要的商品就是洋布。棉纺织业原本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创业先锋，到了 19 世纪初，英国已是世界上棉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国家。4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无疑是英国资本家看中的肥肉。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但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和厚实耐用的中国土布面前，外表美观均匀的机织洋布，“只有以低于中国土布的价格出售才能找到主顾”。^③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生产物的便宜与变革了的运输方法、交通方法……是征服外国市场的武器。”^④由于洋布生意有利可图，19 世纪 50 年代，上海县城和租界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推销洋布呢绒的“洋布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853 年在南京路一带开设的大丰、增泰、恒兴、成德丰等洋布店和同年在在大东外开设的时和洋布店等”。^⑤

大丰洋布店最初是作为门市零售店出现的，设在南京路、河南路的转角处，资本只有 3000 元（两），规模并不大，每天零售额约有五六十元，忙时也不过百余元。大丰最初为翁家独资所开，故又被称为“翁大丰”。但翁家的人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经营，而是聘请“世家子”湖州人许春荣为经理，全权负责上海的门面。由于许春荣头脑灵活，长袖善舞，大丰的生意蒸蒸日上。

1860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长江及北方各口岸被迫开放。上海以其优越的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开埠较早的历史，成为长江和北方各省进出口的集散中心。各地洋布商号纷纷到上海采购，但因资本薄弱，无力经营进口，只有向经销洋布的上海零售店批购。洋布销路的迅速扩大，使得上海一些原来以门市零售为主的洋布店，都转而向原件批发发展，成为“原件批发字号”。大丰也“将门市收

歇，租赁南京路同吉里五上五下楼房，改为原件批发字号”。^⑥

70年代以后，由于电报的广泛使用和汇率的波动，上海的洋行逐渐推行“订货制度”，即商号先与洋行签订合同，预先订购，再由洋行按合同到国外订购，原件批发字号发展成为“订货批发字号”。大丰是向与其有长久供货关系的英商泰和洋行（Reiss Brother & co.）订购兰团龙牌漂布。由于经营得法，销路通畅，深得泰和洋行重视，于是兰团龙牌漂布改为由大丰独家包销，“由大丰和洋行订立契约，每年包销若干数量，如销路畅旺，可自行提高售价，且无同业竞争之虑”。“大丰包牌的兰团龙牌漂布、花蝴蝶尺上绒等，售价一般高过同等质量的商品二钱五分或每码二分五厘”。“大丰的销售对象为北帮、天津帮、祥帮等，每年可获利10万两左右。据说北地消费者非兰团龙漂布不买，北帮办庄以办不到兰团龙漂布为憾。在棉布交易上，一般是跑街迁就客帮，而大丰的兰团龙漂布，因有与洋行的包牌子关系，反是客帮迁就跑帮”。^⑦翁家财源广进，经理许春荣也成为上海滩颇为显赫的人物，除向清廷捐有候补道台衔外，还兼为上海商务总会（总董事会前身）议董，又为德法银行买办、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此时堪称是石塘翁氏家族的鼎盛时期。

宁波不仅以商业闻名宇内，同样以学术誉满天下，被称为浙东文化的代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宋元之际，浙东书院就极为兴盛，科举也颇兴旺，父子同科、兄弟同榜中试者不绝于书，号称“文物之邦”。明代时有人作过统计，结论是宁波是全国科举最繁盛的地区之一。宁波那林立的藏书楼，也可多少反映出当年此地的读书盛况，其中最著名的“天一阁”，几乎是天下读书人憧憬向往的一片圣地。自古江南多才子，而宁波更是人才荟萃。明清之际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及全祖望等人，均名重天下，被视为宁波人的自豪。翁景和在精心致力于积聚财富的同时，并没忘记督促他的儿子们倾心向学，投身科举仕途。

翁景和生有四子：长子运高，次子运文，三子运炽，四子运新。翁运高(1839—1889)字南山，榜名步云，号梯青，才华卓著，雅擅诗文，为当时宁波名士。运高初为宁波府鄞县县学附生，后于同治三年以副贡生获补咸丰五年正科中试第六十一名举人，授内阁中书。

按清代制度，“会试落第举人，可因获中副榜授职。其中明通榜者以教职即用，亦有以主事、知县试用者；其中中正榜者以中书、国子监学正录用。”^⑧翁运高大约即因会试中正榜而得授内阁中书之职。内阁中书在清廷机构中属内阁的办事人员，虽只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可谓“身居要津”。

翁运高有两子，长子翁传洙，字宝森，号勉甫；次子翁传泗，字宝堃，号厚甫。传洙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传泗生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兄弟二人只相差一岁，形影相随，戏嬉互乐，在父母的娇爱之下自由成长，对西方格致新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八股文章、科举仕途。翁运高去世之时，兄弟二人只有十六七岁，失去了父亲的依凭和教导，更加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兴趣。翁传洙兴趣广泛，绘画、音乐无一不好，时常翻阅格致新书，兴之所至，尝购一洋式小火轮，自己开往上海游玩，玩厌倦了便不取分文地送给朋友。翁传泗“好骑射，春秋佳日，携鹰犬驰逐东湖上，意气自豪”，且有好散财济贫的美名，故“呼门就乞者，日常十数辈”，他“每闻扣门声必躬启视，所予辄溢其人之望”。^⑨据说他还曾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宁波炮台司令。

翁文灏乃翁传洙之子，谱名存璋，字永年，文灏是他的学名，以后又自号咏霓、愬士。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翁运高已于半年前去世。虽然此时翁家已不似翁景和时代那般昌盛繁荣，但毕竟是宁波有名富户。据丁文江说，“翁文灏祖父死的时候，他父亲分得二十万两银子，上海还有一所铺子，每年有好几千收入”，他“早年的环境是一个十足的纨绔”。^⑩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没有沾染一点纨绔子弟的恶习，确实难能可贵。

幼年的翁文灏颇受祖母的宠爱，一来因为他是翁家的长房长孙，而且自幼聪慧可爱，其次也是因为他6岁丧母，“幼龄失恃”的特殊经历。

翁文灏的生母余宝玉(1872—1895)是慈溪人，家中世代在上海经商，与翁家祖上即有姻亲关系。翁文灏幼时常随母亲到外婆家游玩，“水从石出真清澈，步逐坡登见曲斜”的乡间美景，给他留下极深印象。因夫妻不睦，在翁文灏刚刚度过6周岁生日的时候，余氏夫人便抛下翁文灏和他仅有两岁的妹妹翁杏仙，撒手入寰。幼年丧母对一个刚满6岁、对人生世事似懂非懂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多亏祖母的爱护照顾，才使他们没有感到太多的凄凉。一年多后，继母叶氏夫人来到翁家。

叶氏夫人名秀芬(1872—1932)，也是慈溪人，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虽然处于继母——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悲剧色彩的社会角色，但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善良贤淑，视翁文灏兄妹如己出，并且教导督促翁文灏勤学苦读，力求上进，使这一双幼小心灵所受的创伤，得到了慰藉。叶氏夫人不仅为人贤惠，而且思想先进，据说她是宁波第一个提倡放足的妇女。在此后的30多年中，翁文灏视继母如生母，细心照顾，赡养终生，竭尽人子之孝，也算报答了这位含辛茹苦有养教之恩的继母。

也就在6岁这一年，翁文灏开始“入塾就读”。启蒙老师叫胡豁堂。当时私塾所读一般是《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圣谕广训》之类。1899年，因石塘家中遭匪抢劫，翁文灏全家被迫避至宁波江北岸引仙桥，租屋而居。他的塾师也改为史隽德。1901年，翁家再迁居宁波城里天封寺前三角地。

当时的中国，甲午战败使社会各阶层受到强烈的刺激，国内人心思变，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倡议革新；孙中山等立誓结盟，号召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又以谭嗣同等人被推上祭坛而告终。